

## “关中·外缘：第八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参与研习心得体会

解祥偉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

2018年7月30日-8月9日，作为营员之一，十分幸运地全程参与了以“关中·外缘”为主题的“西安营”系列研习活动。“西安营”有一流的组织，一流的导师，一流的营员。所以，这次西安之行，我收获颇多，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下面，我简要谈几点心得体会，以供后来者参鉴。

第一、研习营期间，我对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有了初步的认识。由于我所学专业的关系，平常主要以文献研读为基础，对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从未重视，一直认为田野调查是历史人类学专业专有，更不用提这方面的训练了。而这次研习营基本上是将田野调查与导师讲座并重，甚至前者更为重要一些。这次田野调查的点包括宝鸡周公庙、周原遗址，固原须弥山石窟以及西安的伊斯兰东大寺等等。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每个组都有“田野导师”带队。最初，我是有点游离于其中的，看到很多同学在导师的带领下，认真观察，对每一块碑刻都认真研读，拍照，我却是有手足无措。尤其让我惊叹的是，到了晚上的小组及综合讨论环节，很多讨论的展开都是来自于这些细心的观察与碑刻。慢慢地我认识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并逐渐开始仔细观察导师及同学做田野调查的方法，发现大家除了提前阅读相关材料，田野调查时认真观察，不放过一块碑刻外，也针对田野中的发现，私下再查阅相关材料，最终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固原须弥山的调研。当天晚上大家围绕圆光寺中碑刻的相关材料，就汉僧与番僧，明初对西北地区民族问题的政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再一个印象深刻的是来自于浙江大学的彭志同学，通过对周公庙的考察，发现了庙前松、柏种植与祭祀关系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随后他查阅大量相关史料，在研习营结束之前他已经构思了一篇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跨学科学术论文。

通过以上的这些活动，虽然我对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掌握还只是皮毛，有待继续学习，但是我充分认识到了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用心的田野调查是学术灵感的源泉。我马上从事的博士后研究，是做壬辰战争的研究。这是明中后期以当时的朝鲜为战场的，长达七年的中朝联合抗日战争。虽然随着学术积累，现在已经出版了大量的史料，但是如果要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有更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探究这场战争对朝鲜社会的影响，必须要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因为在现在的韩国、朝鲜有大量的民间文献、碑刻史料等待发掘。随着国内对学术研究支持力度的加大，现在也有一定的资金及途径去进行田野调查。我想这次研习营带给我的，

对田野调查研究重视及具体方法的初步掌握，将对我接下来的研究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二、研习营的各项活动，都仅仅围绕着“关中·外缘”的主题展开，在参观、听讲、讨论过程中，我对于这一主题也有了许多的思考。最重要的是通过学员之间的讨论交流，我认识到，中心与边缘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原本就没有绝对的中心与边缘，中心和边缘都是相对的，如果其存在也不过是出于某种目的的建构。以西安这座城市为例，它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都城存在，是全国的中心，尤其唐代长安，盛极一时。但随着全国历史进程的发展，全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等东部地区。长安逐渐成为边缘的存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细想起来，所谓的边缘西安真的是存在的吗？我想至少西北地区的人不会如此认同，可以说这种边缘的认识最多是存在东部地区。以我个人为例，我生在山东，从教育经历来说，本科到博士，所读的不同地方的学校，如济南、广州、天津都是在东部地区。所以，我天然地就认为东部是国家的中心，中西部是边缘。我之前没有来过西安，在来之前，我想象中的西安就是有灿烂的文化文明，但是经济发展一定是落后的，市政建设一定是混乱不堪，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道路不会整齐洁净。但是当我下了火车，踏上西安，用眼睛仔细观察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发现我错了。如果只用市政建设这样一个小小指标来说，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数字，我觉得，西安根本就不边缘，它的市政建设方面比济南，甚至天津都要好，而且好很多。再加上这些天的学习及实地考察，对西安灿烂的古文明有了更多体认，那么可以说，不论是从文化还是经济角度，西安都不是一个边缘，就算是它不是中心，但它也绝非东部人们自带偏见，臆想出来的边缘。我很高兴，这次研习营能让我认识到西安这座美丽的城市。如果有机会，我甚至希望能到这里工作、生活。不执念于中心与边缘的区划，对中心与边缘的人为构建有更深切的认识，人可能生活的更加平和。

第三、通过这次研习营，结交了很多港台地区的朋友，尤其是对台湾同龄人的生活有了更多了解。我想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的组织者，不仅仅是期望两岸学子单纯进行学术上的交流，结识学术研究上的同道，也会期望两岸学子私下交流彼此生活的社会情境，交流同龄人彼此都关心的问题话题。两岸之间由于长期的政治隔阂，且走的是不同的发展轨道，人文环境，社会生活都有许多的不同。我想应该有很多台湾年轻人跟我一样，渴望了解彼此，了解彼此的社会。这次两岸历史文化营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

我们小组里有五位同学来自台湾。彼此文化环境的不同，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比如葛兆光教授讲座之后的晚间讨论中，大家都提到了建国初的民族识别问题。台湾同学对此特别感兴趣，同时他们也提到实际上在台湾现在也存在一个民族识别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较问题。通过台湾同学的讲述，我们知道台湾的原住民

民族识别问题。比如，不像大陆地区的民族识别是一个过去式，台湾的民族识别是一个进行式；不像大陆的民族识别是国家层面的主动介入，台湾的民族识别是原住民本身因为政治经济权益分配的主动要求行为等等。彼此文化环境的不同，也促进了我们之间普通生活层面的交流。比如我在这些天的接触中，就发现了很多台湾地区与大陆的不同与相同的有趣问题。比如台湾的博士培养制度与大陆不同，更接近欧美的制度，学生就读时间普遍较长，六七年甚至七八年，这几乎是大陆学生的两倍。台湾对在职公务人员进修十分鼓励。我们组的江建新同学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桃园某小学的教务主任，一个是台湾政治大学的博士。他在职考取博士后，除周末以外，政府每周给他两天专门的入校学习时间。而且与大陆在职人员攻读学位大多为了一些升职加薪等较为世俗的目的，台湾在职人员更多是为了求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当然，也发现了许多相似的问题。比如两岸年轻人都面临就业、买房等压力，台湾的博士就业压力尤其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李仁渊老师告诉我，很多欧美顶尖名校，甚至哈佛、牛津的博士回来都找不到好的工作，很多去学校的行政部门或者教授通识课程，而进不了专业学院。另外，在全球化的今天，两岸同龄人会有很多共同关注的问题，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比如我们都会关注彼此社会的婚丧嫁娶制度，两岸的政治生态；我们会听很多相同的歌曲，看很多相同的电影，读很多相同的小说。

在彼此的交流中，我们都多敲开了一扇门，了解到了另外一个社会情境的相同或不同的样态。认同的前提，是了解，我想如果我们两岸的年轻人，在彼此了解的道路上能够走的足够远，那么彼此之间的认同必然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这十天的西安之旅，我的收获非常多，包括理性上的，感性上的。不过，限于篇幅，我就简要谈谈以上三点最重要的收获。希望这样真正能够让学员有切实收获的研习营继续办下去，让更多的两岸学子受益。最后，怀着深深的感念，永远感谢相关的基金会及科研机构，感谢所有的会务组织人员，感谢所有的导师及学员！